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前会长窪添慶文：

绵密地追求史料低语之处

“发掘出新的历史事实,或者描摹出新的历史像,我想历史学研究的快乐就在这里。”

恩师西嶋定生与《魏书》研究会

赵立新：您是1960年代考入东京大学的。当时应该正是日本安保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东洋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呢?

窪添慶文：我考入东京大学是在1961年。日本的安保斗争虽然已经在前一年结束了,但在社会上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大学生对政治问题也抱有很强烈的关心。不过,我并不是受了安保斗争的影响选择东洋史的。进大学时本来就是想专攻历史学,特别是西洋史。但西方语言的学习对我来说比较难。考虑到汉文大概还是可以读的,所以我在教养学部二年级时(译者按:相当于中国大学的大二)决定去学习中国史。所以,选择东洋史的契机倒可以说是从西洋史的逃亡吧。

赵：那时候的东洋史专业,在您看来是怎样的呢?

窪添：大三的时候我进入了文学部东洋史学专业。那时候包括研究生在内,学生的政治意识都还是很高的。因为并没有单独的研究生研究室,而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共用一个大房间,所以和学长们的接触比较频繁。当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有一种不做社会经济史就不是历史学的氛围。因此,当我准备以政治制度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时,学长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赵：西嶋定生先生是您的恩师。关于他开设的讨论课和指导,您一定有很多回忆。可否略谈一二?

窪添：学长们都说西嶋先生是非常严厉的。可是在我的同辈人中,却几乎都没有那样的感觉。当然,西嶋先生有时候也会说很严厉的话,我也被先生批评过不止一次。但就平时接触而言,还是相当和蔼可亲的。变化的原因我猜测可能是先生认识到学生们也不太一样了,也就是说现在仅靠严厉是难以吸引学生的。还有就是先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俊文先生曾经在日本东洋史巨擘谷川道雄先生等的支持下,先后推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和《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两种丛书,惠泽一代学人。而今,中日古代史学界更为深入的交流互动又催生了这套《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丛刊》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持编选,2016年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刊行,目前已出六种(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纸屋正和《汉代郡县制的展开》、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窪添慶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金子修一《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我们希望能将引领日本学界近二三十年学术潮流的代表性学者论著完整引入,促进对话。故《丛刊》译事几乎均由活跃于相关领域第一线的青年学者担当,因他们自身的成长同样伴随着对这些论著的阅读和反思。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三位青年学者赵立新、郑威和吕博,分别对《丛刊》的三位作者窪添慶文、池田雄一和金子修一进行专访,或有助于学界更好地理解我们工作的意义。《文汇学人》将分三期刊出。

生的两个儿子与我们的年龄相近,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学长们也会去位于千叶县我孙子市的先生府上拜访,虽然也有休闲的时候,但访问目的还是以学问为主。但到了我们这一辈到先生府上的时候,完全不抱有学问性问题的情形可是不少。有时候还会品尝师母的手作料理,甚至会留宿。虽然知道会占用先生宝贵的研究时间,但我也有好几次在先生府上过夜。

西嶋先生的研究兼具坚实的理论构造和支持理论构造的精密史料考证,这是学界公认的。大如著作,小到某一论题,都贯彻了这种态度。先生喜欢钓鱼,曾经在某报纸的周日版连载过几次钓鱼评论,题为《钓现学序说》。起这样的题目虽然是有些开玩笑的意思,但我想也体现了先生对学问的态度。

先生可能是因为有点胖,夏天特别怕热。每次一到暑假,马上就收拾行李搬到长野县户隐村(当时)的旅馆去避暑,整个夏天都在那里度过。这是在家里安装空调制冷的时代到来之前每年夏天的必然安排。您知道的吧,先生的名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就是在那家旅馆里用一个夏天完成的。作为每年夏天的例行计划,我们学生们也会到先生住的那家旅馆去举行几天的合宿活动。恰是在那

时候——即使是喝酒的场合也不例外——先生的博学多识能够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记得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不能做历史研究者的话,大概会成为生物学家。实际上他有深入了解的学问不只是生物学。在历史学以外,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

先生对世俗荣誉十分淡泊,像大学中行政方面的工作也是尽量躲开的。另一方面,他的座右铭却是“工作到最后一刻”。出版社负责人来医院见他商量著作出版事宜,结果当天他就进了重症监护室。

赵：除了西嶋先生,在东大还有哪些先生给您留下印象了呢?可否略作介绍?

窪添：我们在校的时候,东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除了西嶋先生,还有四位先生。宋代史的周藤吉之先生,人品朴素,讲课时西装上落满粉笔灰的印象很深。东南亚史的山本達郎先生,颇有贵族风度,精通法语。但他常去国外,我没有直接上过先生的课。中亚史的榎一雄先生,为人稳重,富有绅士趣味,但因为是在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兼任要职,故除了必要时间外多在东洋文库。突厥史的護雅夫先生直爽亲切,很受学生欢迎。榎、護两位先生的讨论课我也参加过。

赵：西嶋先生创立了“《魏书》

研究会”,后来是由您倾力维持研究会的活动。可否请您谈谈“《魏书》研究会”的事情?

窪添：“《魏书》研究会”在西嶋先生的指导下成立于1971年。作为位于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之间且给予隋唐帝国很大影响的王朝,北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研究会的旨趣即在于此。不过我推测可能也与时代背景有关,因为1969—1970年东大斗争的影响,当时研究生们对于未来很感困惑。西嶋先生这时创立研究会,或许也有改善学生们状态的用意。总之,研究会一面精读《魏书》,一面进行编制索引的工作。每周活动一次,遇到长假就以合宿的方式进行。每周都参加活动的人数有限,但合宿(夏天例行在长野户隐)时也有其他大学的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人数较多。因为研讨的是《魏书》,虽然也有学长们参加,但我成了核心人物。因为总要在有限时间内推动进度,还被大家戏称为“鬼军曹”(意为“吓人的低级军官”)。

后来正史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检索了,这危及到了研究会能否继续下去。我们苦恼于多年的工作是否还有意义。西嶋先生应该也是有这个苦恼的,但还是决定继续研究会的活动。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网络检索和纸媒检索的意义到底还是有所不同的。或许也是因为先生重视通过研究会的继续活动让青年一代得到教育,培养一体感。

无论如何,大家一起读完《魏书》并做好卡片之后,下面就是由我的个人工作来完成最后成果。而《魏书》研究会则转成了另一种和通常的研究会性质相同的活动形式。每周一次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但夏天的户隐合宿即便在西嶋先生身故之后也仍然继续,一直到现在。户隐合宿以西嶋先生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学生为中心,也有留学生以及在日本的外国人研究者参加,参与者十分多元。要到近年才总算脱去了“《魏书》研究会”的名义呢。

赵：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长年以来在包括您在内的诸先生领导下发展前进,现在已经是日本中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存在。关于研究会的缘起和今后的发展,可否请您谈谈感想?

窪添：在日本,或许是因为激烈的时代区分论争的影响,以魏晋南北朝时代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齐聚一堂开会的机会过去是没有的。関尾史郎兄最先提议,可以暂时先把前辈老师们放在一边,组织只有中青年研究者参加的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安田二郎、中村圭爾诸兄的赞成从而得以发起聚会,时为1989年7月,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有二十四名。会议名为“中青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聚会”。之所以加上“中青年”三字,是因为意识到谷川道雄先生等前辈老师的存在。发起“聚会”的目的还包括参加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大会,后来在1992年实现了这一愿望。此后参加“聚会”的研究者逐年增加,登录会员数达到三位数,另一方面考虑到我们这些当年标榜为“中青年”的研究者年事渐高,2001年起改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

研究会虽然是以交流为目的而发起的,但很快就变成了以研究发表为中心。不过尚未发行研究会刊物。现在有很多会员,应该考虑刊行会志。刊行会志的话,涉及到编辑体制的构筑等问题,决非易事,不过应该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下转5版) ➡

● 受访者窪添慶文先生,1941年生。东京大学博士课程结业。历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手、高知大学教育学部助教授及教授、御茶水女子大学文教育学部教授、立正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会长。现为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著有《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墓誌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等。

● 访问者赵立新教授,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执教于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早期中国史研究会(EMCH)常务委员。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社会史、官僚制度与中古社会。为《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中译本译者代表。